



香港教育大學

The Education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畢業論文題目:

孫子兵法研究史上對『勢』這一概念的詮釋的
歷史脈絡及其軍事史意義

指導老師:朱慶之

學生姓名:李金倫

學號:

摘要

本研究綜述性的研究，目的是理清「勢」這一概念的發展脈絡和變化，及探討其對於軍事學說有何意義或者作用。本研究利用文獻分析法進行比較和梳理資料，廣泛地收集與研究相關的文獻資料，再將蒐集所得的資料進行分析和歸納，從而探明整體的發展脈絡。研究結果顯示，最早為「勢」這一概念作注的是曹操，而他將「勢」定義為依靠態勢。這一詮釋和解讀對於後世的學者和研究者影響深遠，因為根據筆者的梳理資料，發現後世的學者都是以「曹注」的基礎之上加以深化或者補充，而某些時期由於特定的歷史背景因而出現較新的解讀，如解讀為機變或者實力的發揮。但是，態勢這一詮釋依然是主軸，貫穿整個發展歷程。由於本研究的資源和時間有限，未能對所有孫子兵法研究史的文獻和與「勢」相關的文獻作深入研究，故只抽取當中具有標杆和代表性的學者作研究，故此本研究之結論未必完全準確。

目錄

一、引言.....	4
二、文獻回顧.....	4
三、研究緣起和目的.....	5
四、研究方法.....	6
五、中國學者對「勢」這一概念的詮釋的歷史脈絡.....	6
一、開創時期—魏晉南北朝	6
二、繼承時期—隋唐五代.....	7
三、深化時期—宋元	8
四、變異時期—明代.....	11
五、停滯時期—清代.....	13
六、融合時期—近代(民國)	16
七、回歸時期—中華人民共和國.....	18
六、「勢」對推展軍事學說的意義.....	21
一、注重組織與指揮.....	21
二、強調人的主觀能動性.....	22
七、總結.....	23
八、參考資料.....	25

一、引言

陳平原(2002)指出:「所謂學術史研究,說簡單點,不外『辨章學術,考鏡源流』。」辨章,使昭然顯明,考鏡,參證借鑒,意思是使學術彰明較著,使其源流歷歷可考。學術史研究的意義在於通過評判高下、敘述師承和剖析潮流,讓後學能夠了解一代學術的發展脈絡和趨勢,引導和鼓勵其進入該學科之傳統,亦免去長時間的摸索功夫。其次,李學勤(2001)在其《中國學術史》一書中寫道:「學術有著自身的歷史,同時又難免受到整個歷史的影響和限制。研究學術的歷史,從歷史角度看學術,這就是學術史。」學術自身的發展受其所處的時代思想文化潮流影響,所以研究學術史就是研究歷史如何影響學術發展的走向。而在《孫子兵法》裡面,「勢」是最複雜也最核心的一個概念,前人在這一領域的研究成果豐碩,對於「勢」這個概念多有注述和闡發,卻沒有從學術史的角度去探討「勢」義流變。因此,本文希望透過總結前人對「勢」的研究,理清這個概念的整體發展趨勢和演變。

本文首先講述研究的緣起和目的,說明這一研究對於孫子研究史的意義,之後說明是次研究的方法。正文則以時代為綱,各個時代之研究者為目,理清前人研究「勢」的發展脈絡。筆者亦會闡述「勢」在軍事史上的意義,探討其對於軍事理論的發展有何積極的推動作用。最後,本文通過整理和分析前人的研究,呈現「勢」這一概念在學術研究史上的發展脈絡和走向。

二、文獻回顧

本文參考了于汝波《孫子兵法研究史》一書,此書出版於 2005 年,主要從學術史的角度去瞭解《孫子兵法》研究的歷史。《孫子兵法研究史》將孫子兵法研究歷史分為十個時期,分別為遠古至春秋、國、秦漢、魏晉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明代、清代、中華民國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從各個時代為綱,不同的研究者為目,重點分析不同時代孫子兵法研究的特點、重要著作、變化及其原因,亦會闡述當中的歷史背景和文化因素。該書結構分明地將孫子研究分成不同的時期,將重要的著作表列出來,並清楚地論述比較不同學者在注解上的優缺點。本文主要是參考了其分類的方法,以魏晉、隋唐、宋元、明代、清

代、中華民國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作為研究的主軸，輔以各時代的研究為目，將「勢」這個概念的發展趨勢和方向展現出來。然而，《孫子兵法研究史》一書只是論述不同時期注解的特點和優點，沒有針對孫子兵法中個別的概念按年代進行梳理、比較，所以本文嘗試將孫子研究史分成亦個時期去梳理「勢」這一概念的演變和發展脈絡。

三、研究緣起和目的

根據《孫子學文獻提要》統計，古今中外為孫子作注的著作達數千種之多，可見《孫子兵法》的地位之高。(于素波，1994)然而，孫子常用比喻的方式去解釋抽象概念，而不是用定義的方式進行解釋，對現代和古代的學者都造成了理解上的困難。歷代的學者對於書中的概念多有不同的詮釋和解读，因為「勢」是《孫子兵法》中的一個重要概念，所以「勢」這個概念的爭論猶為激烈。(李加武，2014)但是，沒有從學術研究史的角度專門探討「勢」義流變的著作，故這次研究的目的是通過整理歷代學者對於「勢」這一概念的詮釋，梳理出其整個發展過程和脈絡，展現不同時期的理論特點和思想變化，最後探討「勢」對於軍事學說的發展有何意義。

是次研究的意義在於幫助其他研究者在較短時間內，對這個概念的發展歷程與研究成果有較為全面的瞭解，領略不同時期的論述特點及其切入的角度。後學能藉此減省梳爬整理資料的時間，方便了解「勢」的整體演變。從中掌握該前人對這個課題做了哪方面的工作，以引導後世進入這一方面的研究。此外，《孫子兵法》一書為先秦時期的著作，後世為其作注的學者固然是為了探求原意，但另一方面亦是藉孫子闡發和表達自身的思想，所以不同時期的注解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那個時代的軍事理論和思想變化。故此，本文以《孫子兵法》中「勢」這一個概念作為切入點，通過總結前人的研究成果並理清其整體發展脈絡，探討不同時期孫子研究的發展特點和變化，同時亦讓其他的研究者省卻整理資料的時間。

四、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採用文獻分析法作為研究的方法。文獻分析法即是透過蒐集與研究相關的文獻資料，以全面掌握研究題目的一種方法。收集所得的資料要求盡量豐富和廣博，再將蒐集所得的資料進行分析和歸納，從而探明研究對象的性質和狀況，並且從中引出自己的觀點。葉至誠與葉立誠(1999)指出文獻分析的好處在於有助於研究者釐清研究题目的背景、研究的現況和進展，幫助研究者了解過去、解釋現在以及推測未來的功能。本研究蒐集的文獻主要是與研究相關的中文書籍以及期刊論文。

五、中國學者對「勢」這一概念的詮釋的歷史脈絡

一、開創時期—魏晉南北朝

根據《孫子兵法研究史》，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孫子注本有三國東吳沈友所撰《孫子兵法》二卷，賈詡《鈔孫子兵法》一卷，曹操和王凌集注《孫子兵法》一卷，張子尚《孫武兵經》，晉無名氏注《孫子》和南北朝時期《孟氏解詁》等。(于素波，2001)以上的注本皆已散佚，只有曹操所撰的《孫子略解》傳世。

三國曹操用兵任勢

曹操在《孫子略解》中說道：「用兵任勢也。」用兵打仗依靠有利的形勢，善戰者利用有利的態勢，以強擊弱，所以能百戰不殆。(盛瑞裕、李崇興與汪超宏，1995)然而，擁有有利的態勢是依靠將帥在戰爭前的造勢，造勢依靠的是分數、形名、奇正和虛實。曹操對「分數」有以下的注釋：「部曲為分，什伍為數」，所謂「分數」是指軍隊的編制，部曲是大編制，什伍是小編制，將帥透過分層設級和定立編制，從而有效管理大部隊。¹除了分數，曹操亦注釋了「刑名」。曹操將「形」解作旌旗，而「名」解作金鼓，軍隊有了旌旗和金鼓才能指

¹ 李零指出曹操的說法大體上對，但是「部曲」應為漢代的編制，而非先秦時期的制度。先秦稱之為「曲制」或者「曲政」。

揮兵士進攻和撤退，擊鼓進攻，鳴金收兵，兩者是戰場上的指揮系統。(盛瑞裕等，1995)至於「奇正」，即是戰術的變換和兵力的使用。曹操認為「先出合戰為正，後出為奇。」與敵人正面接戰的是正兵，而將軍留作預備隊的兵力則稱作奇兵，奇兵的作用在於打破戰局的平衡，以戰勝敵人。奇正的變化不可勝窮，猶如循環之無端、江河之不竭，敵人不能預測我方的行動，故能百戰不殆。所謂的「勢」就是有利的形勢或態勢。軍隊首先要有嚴密的組織體系，再配以適當的指揮以及戰術，即能製造有利於我方的態勢。有利的態勢已然作成，則將帥只需依靠它便能取得勝利。

魏武帝曹操首開注解孫子的先河，注文清峻通脫、簡要直切，其以豐富的戰場經驗作為基礎，對於孫武軍事思想及理論作了很好的引申和發展。同時，曹注清點了原文的特點和簡明地補充正文未盡之意的作用，故為后來的研究孫子者所重視。魏晉以後的學者在研究孫子一書時，亦多引用曹注原文及沿襲其觀點，或者對曹操的注解加以點評和修改。本文發現曹操的說法影響深遠，不同時期的研究者都曾將「勢」詮釋為態勢。雖然有所增益減損，但是整體的發展脈絡以態勢一義為主。筆者會在下文繼續論述其發展脈絡，並分析後世學者的理解與曹注的相似和相異之處。

二、繼承時期—隋唐五代

魏晉南北朝為注解《孫子兵法》的開端，而隋唐兩代則是《孫子兵法》注解的高峰時期，注家峰起。于汝波認為(2001)這一時期在形式、內容均有變革創新之處，並為後來宋元時代的疏解闡發打下了良好的基礎。這一時期主要的著作有隋代的《蕭吉注孫子》、唐代的《李筌注孫子》、《杜牧注孫子》和《陳皞注孫子》等。《蕭吉注孫子》早已亡佚，故難知其詳。²至於杜佑、杜牧、陳皞等人對於「勢」這一概念並沒有進行論述，從其注釋難以推斷其觀點與想法。

唐代李筌:建瓴之勢

李筌，玄宗至代宗時期人。《郡齋讀書志》中說，「以魏武所解多誤，約歷代史，依《遁甲》注成三卷」，他認為曹操所注解之孫子多有錯誤之處，因而依

²由於隋代速亡，無暇整理兵書，這一時期留下的兵書極少，但其理論價值為此唐代所重視，這是確定無疑的。

照《遁甲》注成三卷。(褚良才，2000)

對於「勢」的理解，李筌認為「形」與「勢」的關係密不可分，故注曰：「陳以形成，如決建瓴之勢，故以勢篇次之。」意解軍隊的陣容憑藉「形」造成，優越的「形」決定了作戰的優勢地位，善戰者憑借優越的「形」去營造有利的作戰形勢，所造之勢不可阻擋。(盛瑞裕等，1995)李氏指出了軍事勝利是建基於強大的「形」之上，在孫子兵法中意指軍事實力，其包括軍隊的數量、裝備的優劣或者糧餉是否充足。若要充分發揮自身的實力和營造有利的形勢，靠的是「分數」、「刑名」和「奇正」。李筌對於「分數」和「刑名」的想法與曹注不無二致，均意指軍隊的組織編制和號令系統。李筌則強調「戰無其詐，難以勝敵」，為將者沒有欺詐，難以戰勝敵人，「奇正」卻猶如日月四時、寒暑更替，沒有窮盡的時候。簡而言之，「奇正」即是出奇制勝，使敵人意想不到，產生突然襲擊的效果，故能百戰不殆、百戰百勝。因此，建瓴之勢依靠的是將帥善用奇正二術，故能營造出來的有利態勢。

李筌很大程度上受到曹操注釋的影響，而將「勢」這一概念的理解為態勢，並且認為造勢需要嚴密的組織和有效的指揮系統，同時將領亦要善於運用奇正，奇正之變化猶如循環之無端，所以能出奇制勝，創造有利的形勢或態勢。在概念的詮釋上，李筌沒有創新和獨到的見解，但他提到「故以勢篇次之。」，略為解釋《勢篇》與《形篇》在排序上的關係。

三、深化時期—宋元

兩宋在《孫子兵法》研究史上具有承上啟下的作用，上承魏晉隋唐之傳統，下啟明清兩代冷熱兵器並用之時代。宋代對於《孫子兵法》方面的研究成果頗多，在編校刊行《武經》本孫子、分類編輯、注解講義和專題研討均作出重大貢獻。(于汝波，2001)當時研究《孫子兵法》的著作近 20 種，當中以《武經七書》、《孫子十家註》和《施氏七書講義》成就最為突出。本文選取當中具有標杆性的學者作為分析的重心，梳理「勢」在宋代的變化和發展趨勢。

階段一、蕭條期

《孫子兵法》的研究發展可分為三個主要階段，呈現由冷而熱的趨勢。太祖至仁宗中期以前對於《孫子兵法》的研究並不熱烈，因為宋初採取修文偃武

的國策，所以兵學不被皇帝和士大夫階層所重視。

階段二、復興期

仁宗中期以後由於邊事頻繁，與西夏和遼等的少數民族政權的戰爭中屢屢失敗，所以掀起談兵的風氣和對兵學的重視。《郡齋讀書志》說：「元昊即叛，邊將數敗，朝廷頗訪知兵者，士大夫人人言兵矣」（褚良才，2000）可見孫子在這一時期的研究相當興盛。

階段三、鼎盛期

由於宋代的印刷術發達，加之戰事頻繁，使得研究孫子的書籍甚多。這一時期多為私人著述，而不是由官方編輯制成。著述眾多反映當時的社會對於孫子一書的重視，但由於戰亂的關係使大量的書籍因此而散佚。

北宋王皙：積勢之變

王皙為北宋仁宗時期的學者，撰有《王皙注孫子兵法》，收錄於《孫子十家註》當中。根據晁公武的《郡齋讀書志》記載：「王皙以古本校正闕誤，又為之注。」並說：「仁宗時，天下久承平，人不習兵。元昊既叛，邊將數敗，朝廷頗訪知兵者，士大夫人人言兵矣。」鑒於古本注釋多有錯漏，加之當時西夏反叛宋廷，士大夫皆喜言兵事，故為孫子作注。

「勢者，積勢之變也。善戰者能任勢以取勝，不勞力也。」所謂的「勢」是指積累多種因素所造成的態勢，而善於用兵的人憑藉「勢」就能輕易地取得勝利。（盛瑞興等，1995）造勢的因素包括運用變幻莫測的戰術、組織的嚴密和利誘惑敵。無法捉摸的戰術使敵人無隙可乘，所以能立于不敗之地，而軍隊之所以亂中有序，變換戰術而不混亂是由於使用旌旗和金鼓指揮作戰，故王皙注曰：「皙謂紛紜，亂之貌也。不可亂者，節制嚴明耳。」王皙又提到：「誘敵使必從」，透過利誘敵軍以形成優勢，用小利去調動敵人，使其陷入我方預設的埋伏或者暴露其虛弱之處，故能營造有利於己方的態勢。恰當地運用虛實、奇正之法，則怯能轉化為勇，弱化為強，將領需要做的只是「任勢」而行，就自然取得勝利，故王皙曰：「謂將能擇人任勢以戰，則自然勝矣。」有了組織和指揮上的優勢，加上恰當地運用戰術，從而累積為不可阻擋的態勢，故能百戰百勝。

南宋張預：用兵的優勢

張預，南宋東光人，撰有《張預注孫子兵法》，收錄於《十家孫子會注》。

他在書中注道：「兵勢已成，然後任勢以取勝，故次《形》。」用兵的優勢已經形成，然後只需要憑藉這種「勢」去奪取勝利。(盛瑞裕等，1995)張預同樣認為造勢依靠的是「分數」和「刑名」，故言：「統眾既多，必先分偏裨之任，定行伍之數，使不相亂，然後可用。」，管理軍隊靠的就是設將校以統御兵士，明確定立各自的職責和各編制的人數，然後軍隊才具有戰鬥力。軍隊除了要有合理的編制，亦需要清晰的指揮系統。為此，張預認為「令士卒望旌旗之形而前卻，聽金鼓之號而行止，則勇者不得獨進，怯者不得獨退。」，從而有效指揮軍隊進行和退卻。張預與曹操的想法不謀而言，指出正面接戰的是「正兵」，從側面突擊敵軍的是「奇兵」，故「三軍雖眾，使人人皆受敵而不敗者，在於奇正也。」³所謂的「勢」就是將領透過軍隊嚴整的編制、指揮的得宜、正確轉換戰術和調配兵力，從而創造有利的態勢。

南宋時期:臨時制敵之勢

施子美的生平不詳，據學者考證，應為金朝人。《施氏七書講義》的序言曾作介紹：「三山施公子美，為儒者流。談兵家事...為吳孫之學者多宗師之。」雖為儒生，卻好談兵事，研究吳孫兵法的學者多以其為師，是《孫子兵法》的重要注本。

《施氏七書講義》注道：「勢者，兵之臨時制敵之勢也。能明乎勢則可以勝敵，此兵勢之所由作也。」換言之，「勢」是因應敵情制定新的策略，從而形成戰勝敵人的態勢，能夠明瞭此勢則可以戰勝敵人，而這亦是兵勢的由來。所謂臨時制敵之法應該是指奇正，奇正亦稱為「機」，其義為機變，所以三軍之眾可使必受敵而不敗。(王光軍，2000)這是因為敵人難以猜測我方之意圖，正而敵以之為奇，奇而敵以之為正，所以作者認為如此則「彼又安能敗我哉？」他又進一步地說奇正之所以能致敵人於死地，是因為懂得虛實的道理。所謂的虛實是指「兵之勢也」，從兵勢之中找出敵方的可乘之機和破綻，避開對方防守的重點然後揮軍擊之，則破之如以卵擊石，這就是所謂的避實擊虛。他更舉了韓信破趙的例子以說明出奇才能制勝的道理。因此，「勢」被施氏理解為臨時根據戰場形勢而改變戰術和兵力布置，以造成一種有利的形勢，以戰勝敵人。

³ 孫子曰：「三軍必受敵而無敵者」，王皙認為「必」應作「畢」，但楊炳安指出「畢」可作訓「皆」，「必」則可訓作若，二者皆可通。

以上三者的觀點都認為「勢」就是態勢，善戰者通過嚴密的指揮組織系統(分數與刑名)和靈活運用戰術(奇正與虛實)，形成有利的態勢。王皙的觀點獨特之處在於他更強調和指出了「勢」是由多種因素積累而成的。張預對於「勢」的詮釋基本上與前曹、李、王無異，如他直接引用了曹注中的「兵勢」和「任勢」二詞，值得一提的是他補充了《形篇》與《勢篇》的排序關係。施氏則更強調「勢」是因應敵情而靈活制定或改變策略，故相較之下，施氏的切入點更為獨到。

四、變異時期—明代

孫子兵法的研究在明代進入新的階段，由以往偏重於注字解詞改為開始闡述疏解孫子兵法中的概念和思想。根據劉申寧(1990)《中國兵書總目》，明代的兵書數量最為豐富，乃中國兵學研究上另一個高峰。最大的原因是印刷術更加發達，刊刻書籍變得更加容易，加之明代中後期邊患頻仍，因而進一步刺激兵學的研究和注釋工作。

明初:破敵之勢

劉寅為明代初年人，著有《武經七書直解》一書，為官方刊刻的武舉教科書，是明初較為重要的孫子注本。《武經七書直解》注曰:「勢者，破敵之勢也。乘敵人有可破之勢，奮兵擊之如破竹如摧枯拉朽，勢不可遏。」所謂的「勢」是指破敵的態勢，乘敵人出現漏洞而予以奮力一擊，則擊敗敵軍猶如破竹之勢，不可阻遏。(邱復興，2004)為將者乘破敵之勢猶如摧枯拉朽，所以孫子以轉圓石於千仞之山來比喻「勢」的險峻和不可阻擋。在他看來，「勢」被理解為不可阻遏的力量，而要做到破敵之勢就要尋找敵人的可乘之處，從其漏洞進攻就能達至破敵如破竹的效果。故此，他說:「故善戰者，其勢險，勢險則禦其節短，節短則易勝如魏義破公孫瓚。」除了要尋找敵人可乘之機，做成的「勢」要險峻而且短促，勢險和勢短則敵人難以招架和防禦，所以破敵就如歷史上魏義打敗公孫瓚的事例一樣。劉氏對「勢」這個概念的詮釋亦是沿用了曹操、李荃的說法，也就是將它解作態勢，但是他更突出「勢」的險峻，有如利刃，攻擊敵人兵力虛弱的地方。

曹操提出「勢乃用兵任勢」這個論述後，後世的兵家以此作為基礎，不斷豐

富曹氏的解釋。本文發現明代或以前的研究者均以態勢為主流解釋，並且各自有所深化和補充，如宋代的王皙指出態勢是經由積累多種有利因素而形成的，而施子美則強調態勢的可變性，由於敵情或者戰況變化莫測，故為將者需要因時制宜、隨機應變，以創造有利於我方的形勢。至於明初的劉寅則更形象地去描述態勢所造成的衝擊力，依靠「勢」就能如摧枯拉朽一般擊效你的敵人。因此，明初以前的論述多受到曹注的觀點所影響，都認為孫子所論的「勢」是指態勢。

明中葉:排兵布陣

趙本學，明代中期人，善於以《易》演兵，撰有《孫子書校解引類》一書。他在《孫子書校解引類》中注道：「勢者，排兵布陣，有奇有正。」所謂的「勢」其實是指排兵布陣，而陣法有正有奇，「正兵主於自固，奇兵主於制勝」正兵主要用於保護自己，奇兵主要用於克敵制勝。⁴善戰者根據戰場的情況，變換陣法，以造成出奇制勝的效果。(王光軍，2000)趙本學的觀點與唐代和宋代的學者存在巨大的差異，一改前人的說法，而認為排兵布陣才能是「勢」的真正含義。原因在於趙本學認為《勢篇》的要旨是論述陣法，他在注釋中提到：「世人不善讀《孫子》書，每恨其不及於陣法，殊不知此篇皆陣法之要旨，誠能以孔明八陣圖參此篇而推演之，古人所秘于千萬世之上者，皆得之矣。」但是，趙本學未有解釋為何《勢篇》的主旨為論述陣法，所以筆者未能作進一步闡述。

明中後期:「勢」即機變

李贄為明代中後期頗有影響力的史學家、思想家和文學家，對於兵學亦有所鑽研，並著有《孫子參同》一書以闡述其兵學思想。李贄認為：「勢者，機也」機者，機變也，因應戰況而變換戰術。⁵之後，李贄補充道：「機動而神隨。故言軍形，便言兵勢」也就是說靈活地改變戰術以適應戰勢，戰術的改變使軍形產生變化，形成有利的兵勢。(閔于忱，1995)兩者是息息相關，勢隨着形的變

⁴ 趙本學的解釋主要從戰術角度去詮釋的奇正，通過靈活調配戰場上的兵力布置，達至變換戰術的效果。奇正可從戰術、戰略的層面去理解。在戰略的範疇而言，公開宣戰就是正，不宣而戰就是奇。在戰術的範疇而言，改變軍陣和隊形就是奇正的變化，軍陣中有奇兵與正兵，正兵與敵接戰，奇兵出其不意打開缺口。

⁵ 奇正，為古代兵家的重要術語，奇字可讀成機(jī)。古人認為「餘奇」即是「一」，它是數字變化的關鍵，任何偶數加一即變成奇數。在手中留有「餘奇」就可以做成變化，同樣在軍事上，機動力量被稱為「餘奇」，亦即是通過添加兵力造成戰場形勢的轉化，故這種靈活變化的力量稱為奇(機)。

化而改變。與李氏同時期的黃獻臣，亦抱持相同的觀點。黃獻臣的生平不詳，但史載其撰有《武經開宗》一書。《武經開宗》一書注道「勢者，隨時進退之宜也。」所謂隨時進退之宜是指根據當時的形勢，適時地進攻和撤退，以及制定合宜的戰術。換言之，「勢」即是因應戰況而制定進攻和防守的策略，運用得宜則可以使敵人不能夠抵擋，所以「形示人不可測，勢使人不可禦。」雖然李贄和黃獻臣的言詞各異、表述不一，但兩者都存在一個明顯的共同點，也就是承認「勢」的特點是隨機應變，因應敵人的反應或戰場形勢而改變戰法。

明初對於「勢」這個概念的詮釋主要沿襲唐宋時期的說法，主要原因在於明初的孫子兵學研究由官方主導，繼承宋代以來的傳統，並沒有創新的觀點。由於明代中後期的戰亂頻仍、外患不斷，孫子兵法的研究亦有嶄新的發展，開始從新的角度理解「勢」，並將其定義為「排兵布陣」和「機變」。(于汝波，2001)前人認為勢即態勢，奇正是營造態勢的手段和方法，但明代中後期的研究者則認為勢乃奇正之妙用，反過來將造勢的手段看成是「勢」的本身。

五、清代:停滯時期

清初對於《孫子兵法》的研究上承宋明，隨着政治、軍事和社會的變化，以及受到近代西方軍事衝擊，因而呈現階段性的發展。于汝波(2001)指出清代的的研究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清初的武闡研究、清中葉的考據時期和晚清的復甦時期。

階段一、武闡時期

清初的《孫子兵法》研究主要以武舉應試為宗旨，較為具代表性的書有朱墉輯注的《武經七書匯解》和丁洪章輯注的《武經七書全解》。在理論思想上對《孫子兵法》有比較深刻闡釋的是由鄧廷羅所著的《兵鏡三卷》。

階段二、考據時期

清代中葉的《孫子兵法》研究則以考據為主，當中具代表性的學者有孫星衍、畢以詢、章學誠等人，著作大多偏重論述孫子的生平、成書時間、書的篇數和進行文字校訂，而不是詮釋《孫子兵法》當中的概念，所以清中葉的著作在孫子研究史上沒有突破的觀點。

階段三、融合時期

進入晚清發展階段，有關孫子的研究開始復甦和振興，較為有代表性的有顧福棠的《孫子集解》和黃鞏的《孫子集注》。

清初:鄧廷羅

鄧廷羅，順治年間人，注有《孫子集注》一卷。他在《孫子集注》中注道：「形震而勢張，次《兵勢》。」大致的意思就是「形」得到整理，「勢」就能得以彰顯其威力。高佑仁(2018)在其《清華伍書類文獻研究》一書指出「震」和「振」在意義上存在聯繫，「震」字通「振」字，有整理和治理之義，所以「形震」可以寫成為「形振」。由此，「形振而勢張」就是說軍隊的陣容得到整理，因而使其「勢」壯大或者強盛。從鄧廷羅對「勢」的詮釋可以看到，他的觀點與唐代李荃「陣以形成，如決建瓴之勢，故以勢篇次之。」有異曲同工之妙，兩者都認為軍隊的陣容建基於形，陣容得到整治則勢強，所以能造成不可阻擋之勢。由此可見，鄧廷羅對「勢」的詮釋深受李荃注本的影響。

清初:王瞰

在清初孫子注家之中，王瞰亦是當中的代表性人物，撰有《武經三書集註》和《握機經解》。王瞰的注解詳細，融會《十家注孫子》和《武經七書直解》的觀點，並參以己見，所以自康熙年間成為武舉取士的教科書之一。(于汝波，2001)王氏認為「勢者，形之變動者也。」換句話說，「勢」是「形」的動態表現。他進一步解釋，並說「形為體，勢為用，陣以形成，戰以勢決。」形是軍事實力的本質，勢是軍事實力的表現，實力強則兵力多，兵力多則軍容盛，故能營造強大的態勢以取勝。然而，只有陣容強大不足以取勝，所以他說：「然戰勢不過奇正，是以篇中首言奇正相生之妙，次言奇正發動之速，終言奇正所以致敵虛實之術。」，也就是說營造有利的形勢是依靠奇正和虛實二術，使得自身的實力得以充分發揮，故能依賴有利「勢」而取勝。因此，「勢」就是將客觀的物質力量通過有效和得宜的戰術，從而展現出來的一種力量。因此，從王瞰的論述亦可以看到其受到李荃的影響，同樣認為「勢」是以軍事實力為基礎。

清末:顧福棠

踏入清末，以顧福棠、黃鞏為首的學者開始將《孫子兵法》與西方軍事理

論相結合，嘗試重新審視孫子的戰略和戰術思想，在《孫子兵法》研究史上具有開拓性的意義。

顧福棠，江蘇武進人，撰有《孫子集解》一書，刊於光緒二十六年。其書對《十家注》本，去蕪存菁，刪其不宜。他認為「初見者謂之形，見而共著者謂之勢，形微而勢顯故，以勢次形之下。」在戰爭未開始之前已然知曉的稱之為「形」，將自身的實力充分發揮和顯現出來，謂之「勢」。(邱復興，2004)顧氏將這個概念詮釋為實力的發揮，亦在一定程度上繼承了李荃的說法，也就是說「勢」是建基於一定的軍事實力之上，但是想戰勝敵人就必須將之轉化成為有利的態勢。一旦形成優勢，依靠強大的優勢就能輕易戰勝敵人，所以從顧福棠與鄧廷羅的觀點都可以看到，兩者都較為受到十家注中李荃的影響，認為「勢」是建立在形之上，是軍事實力體現，而爆發出來的力量猶如如決建瓴之勢。其次顧氏與李氏同樣論述了《形篇》與《勢篇》的邏輯關係，因勢建基於形，所以《勢篇》次於《形篇》，由此亦可見其受李氏影響之深。

清末:黃鞏

黃鞏，清末湖南長沙人，撰有《孫子集注》，成書於光緒年間。《孫子集注》擺脫了清初武闡讀物的套路，兼采諸家之長，申明其文義。黃鞏注曰：「整軍陳列，則有形可觀，至於戰鬥變化莫測，只能任勢，不能觀形也。」(邱復興，2004)意思是整頓軍隊，使自身的軍力(形)強大，所以有「形」可觀。但是戰鬥變化莫測，只能夠依靠態勢，不能只依賴軍力的強。黃鞏引申出兩個重要的觀點，首先「勢」是建基於充足的軍事準備，軍容得到整治，才有強大的軍力。但是，戰場形勢瞬息萬變，只能依靠態勢去取勝。在論述「勢」的本質上，黃鞏的說法與曹操的「用兵任勢」並無二致，同樣認同依靠態勢是取勝的重要因素，而態勢的營造取決於「形」的強大，故與李荃之「陣以形成」有異曲同工之妙。

綜上所述，清代的主流觀點是將「勢」理解為實力的發揮。唐代的李荃認為「形」是「勢」的基礎，而清代的學者更進一步，認為「勢」則是「形」的發揮。善戰者在強大的軍事基礎下，通過恰當地調配兵力和轉換戰術，將自身的實力有效地發揮，從而營成強大的態勢，然後任勢以取勝。由此可見，清代的研究者深受唐代李荃的觀點影響，指出造「勢」不能沒有客觀的軍事實力支持。其二，充分發揮自身的實力，則能造成不可阻擋之勢，為將者只需依靠這

個態勢就取勝，這種論述與曹操的說法相同。

六、中西融合時期—近代(民國)

民國時期的《孫子兵法》研究從內容和形式上都有所革新，為古代孫子學走向現代「孫子學」架起了橋樑。研究者開始改變只重視字詞校勘注釋的傳統思路，改為注重闡發孫子軍事思想。

民國劉邦驥:勢者，詭道也

劉邦驥，北洋政府少將參議，受大元帥之命而作《孫子淺說》。該書引用西方軍事理論闡釋孫子之思想，標誌近代「孫子學」的開端。劉邦驥在《孫子淺說》中指出:「此一篇發明第一篇，因利制權及詭道之義也。」(邱復興，2004)《勢篇》為闡發《計篇》，因利制權及詭道的道理，因為財政外交內政均已修明，然後為在外軍隊製造有利的態勢。造勢靠的是詭道，《勢篇》最主要論述的是如何造勢，故言「勢者，即詭道也。」劉氏認為詭道有兩種形式，分別是「奇正」和「虛實」。《勢篇》為專論奇正的章節，所以《勢篇》的核心就是奇正。詭道亦即是透過靈活轉換戰術或調動兵力，使敵人預測不到我方的目的和動向，因而達至出奇制勝的效果。

民國錢基博:因利制權

錢基博，江蘇無錫人，著有《孫子章句訓義》，初版於民國 28 年。此書對《孫子》多有闡發，為民國《孫子》注釋著作中的佼佼者。《孫子章句訓義》將「勢」定義為「因利而制權，決於臨敵之日」，所謂因利制權是說抓住有利的條件，以制定隨機應變的策略，而不能與敵接觸之前就能夠制定的。(邱復興，2004)根據戰場的實際情況而轉變己方的戰略戰術，運用假象迷惑敵人，用而示之不用，能而示之不能，使得敵人無所適從。若能因利而制權，「以我之節短勢險，而攻敵之不虞，如轉圓石於千仞之山，勝之易易耳」，攻擊敵人就如在千仞之山滾下圓石一般，勢不可擋。因此，「勢」指的是根據戰場實際的情況，臨時制定戰略或戰術，以適應當時的戰場形勢。

民國李浴日:「勢」即能量

《孫子兵法之綜合研究》一書中並沒有深入解釋「勢」的含義，李浴日(1943)認為「勢」等於英文 Energy 一字，由此可以推斷出「勢」指的是一種能量。李氏認為「勢」依靠奇正之道，善用奇正，從而將戰爭的態度向有利的方向轉換。故其言「戰鬥不外奇正的兩端，活用奇正，以導戰勢於有利。」其次，作者認為將領要善於發揮部下的特長，才能產生最大的能量去戰勝敵人，而非去苛責部下或諉過於人，所以李浴日說：「善於為指導戰鬥的情勢，向自然而有利的方向發展，亦唯如是，能使部下與部隊盡量發揮其長處與性能。」因此，「勢」是一種強大的能量，依靠將領善用奇正以營造出銳不可當之力量以攻擊敵人。

民國陳啟天：「勢」即謀略

所謂「勢」，陳啟天(1947)在其著作《孫子兵法校釋》中定義為戰略或戰術，簡而言之即是謀略。⁶然而，戰略或戰術務求「急疾捷先，為狀甚險，為力甚大，故以勢字名之」，用兵貴乎險疾捷速，其進攻之勢猶如雷霆萬鈞，節奏是短促而態勢是險急的，所以用「勢」名之。而他又引用後漢書崔駰傳注云：

「勢，調謀略也。」論證「勢」乃意指謀略。謀略講求的是任勢，而任勢者即是正確運用戰略戰術，而戰略戰術的基本形式有奇正，奇正是指正面用兵進攻，奇兵則是指側面橫擊，而奇正之變化猶如江河日月，奇可以變為正，正可變為奇，兩者相互配合得當則能獲勝。(陳啟天，1947)謀略就是孫子所言之「勢」，而謀略之重要形式為奇正，奇與正互相配合，運用得宜則勝。

雖然劉邦驥與錢基博的表述各異，但兩者都認為「勢」的核心是權變，即因應敵人的行動或戰場的形勢而轉變策略，與明代李贄、清代黃輦等人的說法相似。李氏的觀點摒棄了中國傳統的觀點而吸收西方學者的研究成果。西方早期比較有代表性的譯本就是將「勢」翻譯為 Energy，李浴日亦將「勢」詮釋為能量，並以英文 Energy 一字作補解，故他很可能受到西方譯本的《孫子兵法》所影響。⁷陳啟天的切入點與前人不同，前人認為勢是態勢，善戰者依靠先進的戰略戰術創造有利的態勢。他則認為戰略、戰術就是「勢」的本身，而非謀略所造成的結果一態勢，所以其觀點較為獨特。

⁶ 鈕先鍾《歷史與戰略：中西軍事史新論》一書指出戰略為西方傳來的軍事術語，源自希臘文 Strategia，原意為「將軍」，引申出「領導」之意。民國時期傳入中國，被廣泛使用，成為常用的用語。

⁷ 翟爾斯(Lionel Giles) 首先將「勢」翻譯為 Energy，亦即是能量的意思，並且是通過各種方式累積而成的一種力量 “the application, in various ways, of accumulated power”。

七、回歸傳統時期—中華人民共和國

踏入中華人民共和國時期，孫子兵法的研究可分為三個階段，分別是新中國成立初期、文革時期和改革開放以來時期，這三個階段呈現出不同的特點。

階段一、建國初期

建國初期對於《孫子兵法》的研究主要由官方所推動，作為軍事人員和幹部的學習材料。故將《孫子兵法》重新注釋，使之適合現代讀者閱讀，為「孫子學」現代化作出了一定的貢獻。

階段二、文革時期

于汝波(2001)指出文革時期有關《孫子兵法》的著作受極「左」的思想影響的，其內容和形式受到局限，學術價值因而不高，所以本文並不會引用當中的任何著作。

階段三、改革開放以來

中國自改革開放後，不單止經濟上取得重大的飛躍，學術文化研究事業亦取得長足的發展。《孫子兵法》研究進入了最為活躍的時期，取得豐碩的研究成果，郭化若參考銀雀山漢簡，對《孫子今譯》進行了修訂，出版了《孫子譯注》一書，陶漢章則以劉伯承的筆錄為基礎，重新出版的《孫子兵法概論》。故本文主要以改革開放後的文獻作為研究材料，因為這一時期的資料更有學術價值。

一、物質的運動

郭化若(2006)認為「形」是指客觀的物質力量，例如國土面積、糧食生產和人口數量，而「勢」則是物質的運動。物質主要是指軍事實力，但是軍事實力只是牌面上的勝利，若要將可能性的勝利轉化為實際的勝利就要依靠軍隊的組織嚴明，部署得當，即使遭受敵人的進攻也不致於失敗。表面上顯得紛紛紜紜和渾渾沌沌，但是實際上是亂中有序。亂而有序是由於組織嚴密，指揮有方。嚴密的組織和有效的指揮系統是不足以取得勝利，還要善於運用奇正和虛實，也就是靈活地調配兵力和轉換戰術，從而形成孫子所謂的「勢」。

另一位學者吳如嵩亦抱持相同的觀點，他在《孫子兵法淺說》中說：

「《勢》篇中的「勢」，是《形》篇中「形」的表現」，「形」指的是軍事實力，客觀地表現為眾寡、強弱，即是兵力數量之多少，軍隊戰鬥力的強弱。(吳如嵩，2003)先立於不敗之地，然後在軍事實力的基礎之上，實行正確的作戰指揮和策略，從而在戰場上表現的實際作戰能力，所以他說：「形是運動的物質，而勢就是物質的運動」(吳如嵩，2003)簡而言之，「勢」即是軍事實力透過組織和指揮，配以戰術上的靈活變通以及選擇正確的進攻方向，從而將軍事力量最大限度的發揮。人們透過嚴密的組織、有效的指揮和善用奇正二法，將物質的力量發揮和調動出來，所以「勢」指的是物質的運動。

郭化若和吳如嵩都認為「勢」指的是物質的運動，這種解讀與前人的說法相似。清初的王瞰就定義「勢」為「形之變動者」，此與「物質的運動」的論調並無二致，都指出「形」為客觀的軍事實力，而「勢」就是通過運動將此種實力轉化為力量。然而，以「物質的運動」這一術語去定義「勢」很可能受到辯證唯物主義所影響。張建映與張躍濱(2005)指出辯證唯物主義認為凡是運動，都有物質作為它的基礎，沒有物質的運動是不可能的。故兩位學者有可能套用了辯證唯物主義，將孫子中的「形」理解為物質，而「勢」詮釋為運動，既解釋兩者的關係，亦詮釋了「勢」的意思。

二、「勢」即態勢

陶漢章：戰略或戰術中有利態勢

陶漢章(1985)在《孫子兵法概論》一書中將「勢」定義為戰略和戰術中有利的態勢，務求使自己處於主動、機動和靈活的優勢地位。至於兵勢的構成有幾個重要的條件，一是實力，二是占據有利的地形，三是部隊訓練精良、指揮得當，四是將領善於捕捉和把握戰機。故陶漢章說「勢」是通過「運用各種有利于我方的條件來造成」造成的「勢」既急促而且猛烈，使敵人措手不及，故其勢不可擋。(陶漢章，1985)因此，所謂的「勢」是指在巨大的優勢下，憑藉靈活的戰略或戰術，造成一種有利的態勢。

李零：因敵而設的格局

李零(1997)在《吳孫子發微》一書中提到「勢」含有態勢之義，泛指戰爭中一切易變、人為和潛在的因素，例如士兵的勇怯、指揮的靈活，依靠奇正之術以製造戰場上的優勢。作者另一本有關孫子兵法的著作《兵以詐立·我讀孫子》則認為「勢」是指因應敵人而設的格局。「勢」的特質是既看不見，亦摸不

着，相反「形」是可見的東西。(李零，2006)其次，「勢」是動態的東西，而「形」是靜態的東西。最後，「勢」因時制宜和因敵而設的，相反「形」是自身已經具備的條件，如糧草、賦稅和糧草的充裕與否，所以他說「形是勢的基礎，勢是形的發揮」。總而言之，李零認為「勢」是人為所設的一種格局或者態勢，通過製造機變和出奇制勝，以達至形格勢禁，不可阻擋之勢。

楊炳安:作戰態勢

楊炳安(1986)認為「勢」是指作戰態勢，根據一定的作戰意圖而靈活運用戰術和調配兵力，從而造成一種客觀的作戰態勢。《形篇》論述的是如何使自身具備勝利的條件，而《勢篇》則是論述如何使勝利的可能性轉變為現實性，這仰賴於營造強而有力的態勢。孫子說「勇怯，勢也」，軍隊處於有利的態勢之下就會表現得勇敢，解決勇怯問題的關鍵在於恰當地運用奇正。正所謂「戰勢不過奇正」，奇正簡單來說就是戰爭中正面與側翼，從正面進攻敵是為正，從側面襲擊敵軍是為奇，但是實際上奇正之間的轉化是變幻莫測的，猶如日月四時般循環無端，故能攻其不備、出其不意。(楊炳安，1986)有了這種態勢，攻擊敵人就如摧枯拉朽，不可阻擋。因此，所謂「勢」即是有利的作戰形勢，善戰者依靠「勢」以取得勝利。

鈕先鍾:會戰的態勢

鈕先鍾(1996)在《孫子三論》中指出「勢」是態勢，善戰者通過巧妙運用奇正二法，從而為我軍在特定的會戰地點創造有利的態勢。歷代學者對於「奇正」的看法各異，但鈕氏認為奇正分別指正面部隊和預備兵力。正面的主力部隊與敵軍接戰時，預備隊作為機動力量施以突然襲擊，從而擊敗敵軍。奇正之所以能克敵制勝是因為其勢險節短，勢險故能儲蓄大量勢能，節短故能用力恰到好處，因而產生最大的殺傷力。有利的態勢已然造成，我軍因為處於優勢，故其士氣高昂、銳不可當。(鈕先鍾，1996)如能如此，則可「擇人而任勢」，為將者只需依賴有利的態勢便可取勝，而不需苛責於人。在鈕氏看來，「勢」就是的態勢，責於人。在鈕氏看來，「勢」就是的依賴戰法的變化和轉換而造成的有利態勢，其威力如轉圓石於千仞之山，所以勢不可擋。

魏汝霖:破敵之態勢

魏汝霖(1984)認為「勢者，破敵之態勢也。」《勢篇》的核心是「奇正」，

憑藉奇正之妙用造成破敵之態勢。⁸奇正二者猶如五色、五味、五聲一樣變化無端，不可勝窮。換言之，奇正是戰爭藝術之極致，運用得宜則臨敵必勝，破敵如以卵擊石，不可阻擋。除了將「勢」理解為破敵的態勢之外，他亦將「勢」視為戰爭藝術，並引用蔣介石的說話「把戰爭看成五色、五味、五聲一樣的詭詭炫妙，才是真正體會到了戰爭藝術化與完美的奧秘」若運用得宜則有如藝術一般詭詭玄妙，破敵之態勢。

比較上述五位研究者的論述可以看出，雖然對「勢」的詮釋並非完全相同，但是他們都將「勢」詮釋為透過靈活調配兵力和變換戰術，而造成的一種作戰態勢。從其遣詞用字方面，他們與明代或以前的說法頗為相似，如魏汝霖說「勢者，破敵之態勢也」，幾乎是引用了劉寅的原文。對於概念的詮釋方面，五位研究者同樣理解「勢」為作戰中的態勢，回歸到明代以前的傳統觀點。總而言，新中國成立以後的孫子學研究以「態勢」一說為主流的詮釋，而「物質的運動」一說則是套用辯證唯物主義去解釋「勢」的內在含義，強調物質與運動的相互轉化的關係。

六、「勢」對推展軍事學說的意義

《孫子兵法》所提出的軍事理論和思想超越時空和地域，因而被廣泛適用於現代軍事鬥爭之中。「勢」作為《孫子兵法》中最核心的概念，當中包含不同的指導性原則，例如它強調軍事組織的嚴密性、人的主觀能動性，這些原則受到後世軍事家和軍事理論家所重視。從這個意義上來講，《孫子兵法》具有超越時空的價值。

一、注重組織與指揮

嚴密的組織與指揮造就軍事上的優勢，這一重要原則為歷代軍事家所重視。孫子在《勢篇》提到：「凡治眾如治寡，分數是也；鬥眾如鬥寡，形名是也」治理和指揮龐大的軍隊，建基於嚴密的組織和有效的指揮之上，因為沒有

⁸ 明代的劉寅曰：「勢者，破敵之勢也。」，魏汝霖與劉寅之語句幾乎完全相同，但未能證明兩者存在繼承的關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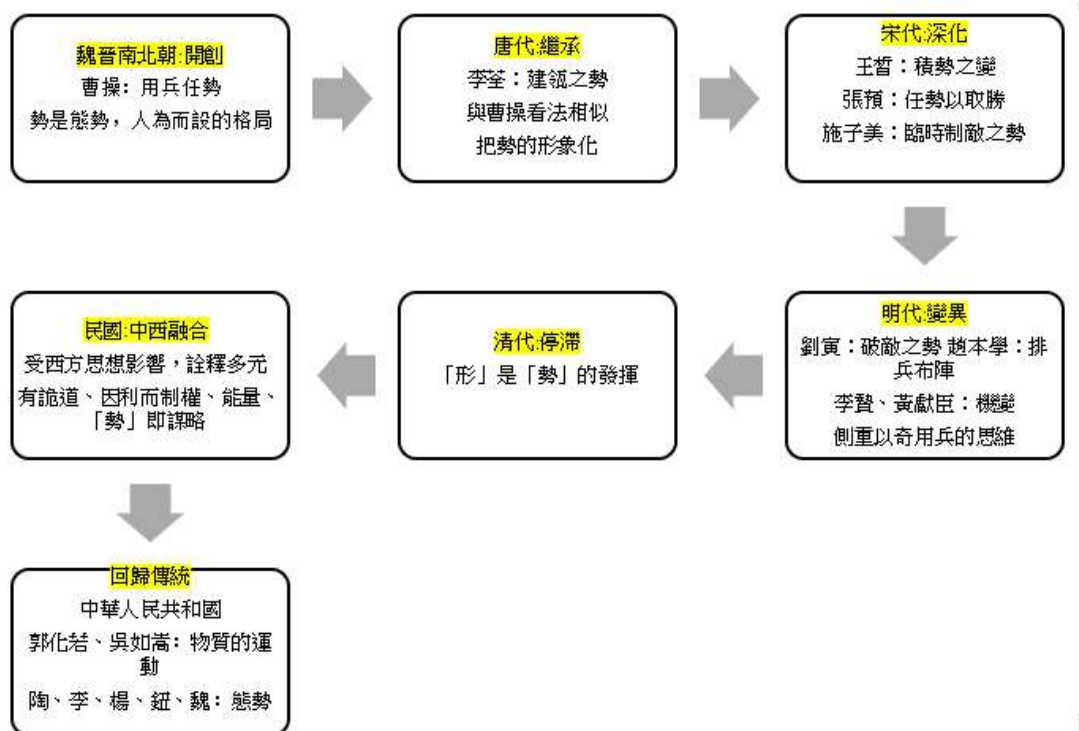
編制架構則為將者就以管理人數眾多的部隊，沒有清晰的指揮系統則將帥的作戰意圖難以順利傳達至軍官和士兵，並且有效地執行。故此，孫子提及的「刑名」和「分數」受到歷代的兵家所重視，如明代的戚繼光在《紀效新書》曾言：「治眾如治寡，分數是也。分數者，治兵之綱也。」⁹、「竊觀古今名將用兵，未有無節制號令，不用金鼓旗旛，而浪戰百勝者。」和「鬥眾如鬥寡，形名是也，故萬人一心，形名之效。」(戚繼光，1996)意即部隊的編制與號令是有效管理的關鍵，而金鼓旗旛則是節制調度軍隊的手段，缺少任何一項要素都不能克敵制勝。在論述戰術或戰略前，軍隊的組織與號令是任何兵家都重視及後世兵家深受「勢」的影響，這一原則成為指導軍事作戰的重要思想，為兵家學說的基礎。

二、強調人的主觀能動性

《勢篇》強調通過靈活變換戰略或戰術，從而營造有利的態勢，這一思想打破了迷信的制勝觀。《中國古代軍事思想史》一書指出秦漢時期的制勝觀存在缺欠與不足，相信通過星相、占卜和鬼神相佑等手段去獲得勝利，這種思想普遍存在於兵陰陽家的著作之中。(張明與于井堯，2006)《漢書·藝文志》就記載道：「陰陽者，順時而發，推刑德，隨鬥擊，因五勝，假鬼神以為助者也。」可見兵陰陽家將戰爭的勝負因果與鬼神占卜或星辰變化聯繫起來。⁹相反，「勢」強調的是主觀能動作用的發揮，可以經由人的行動去造成戰場上的有利形勢。用兵有為的思想在中國軍事史上具有重大的意義，中國歷史上曾多次出現以少勝多的事例，弱小的一方採取靈活多變的戰術和巧妙地兵力調配，從而創造有利的兵勢，如官渡之戰中曹操就以主力與敵對峙於官渡，以小部隊突擊白馬、烏巢，造成出奇不意的效果，因而大敗袁紹的軍隊，取得最終勝利。弱的一方只要採取正確的戰略和戰術，揚長避短，就可以為勝利創造有利的條件。用兵有為的軍事思想影響深遠，擺脫以占卜方式預測戰爭結果的迷信思維，而主張積極有為地創造條件，促成戰勢由弱向強轉化。

⁹ 兵陰陽家對於戰爭的制勝觀，在《史記·天官書》、《漢書·天文志》和《後漢書·天文志》等古籍均有記載。

七、總結



從「勢」的發展脈絡可以看到，魏晉南北朝在軍事學說上具有開創性，首開為孫子注解的先河，後人以此為基礎加以闡發其軍事思想。唐代的軍事思想顯得較為固化，因其受曹注的影響頗大，並不能擺脫前人對「勢」的理解。而宋代的學者則在唐代以前的基礎之上，加以補充自己個人的看法，豐富了前人的觀點。明代的軍事思想出現比較為大的轉化，更加側重出奇制勝、以奇用兵的思維，所以本文稱之為異化時期。清代的軍事思想則呈現停滯不前的特點，沒有太大的突破或創新，只是揉合前人的觀點作為自己的解釋。至於民國時期的學者因受西方思想影響，而產生革新的想法。新中國成立以後的發展特色是回歸傳統，認同明代以前的研究者對於「勢」的詮釋。

總的來說，雖然各研究者在表述或言詞上存在差異，但本文發現「勢」的整體發展脈絡，以態勢這一詮釋作為主軸。不過，由於明代中後期外來文化的滲入和作戰需求的轉變，因而產生新的詮釋和理解。明中葉的趙本學最先為「勢」賦予新的含義，不再沿用舊的定義，而將「勢」理解為排兵布陣。明代以後的研究者對「勢」的詮釋開始更大幅度地偏離前人的研究，如強調其機變的特質，認為「勢」的核心為奇正之靈活變化使用，故詮釋為「隨時進退之

宜」。近代的孫子學研究則普遍沿襲清末的說法，但由於受到西方軍事思想的影響，因而出現新的含義和定義。至於現代的學者結合出土文獻和近代以來對《孫子兵法》的研究，重新詮釋「勢」這一概念。改革開放以後的大部分學者都認為「勢」指的是憑藉戰術或戰略的有效變換，從而創成有利於我方的態勢。從意義上來說，將「勢」詮釋為態勢貼近早期孫子研究者的觀點。

至於「勢」對推動軍事學說的意義有二，治兵先分層設級以統御士卒，練兵先使士卒熟習號令指揮，這一原則成為兵家思想的基礎，用於指導實際的作戰。其二，營造有利的態勢以取勝強調的是人的主觀能動性，捨棄了以鬼神占卜等手段去獲取戰爭勝利，而是透過事前周詳的謀劃和得宜的戰術、戰略，創造有利的形勢，從而獲得勝利，顯得更為科學和客觀。

八、參考資料

1. 褚良才(2000)。〈宋刻本《十一家注孫子》匯考〉。浙江大學學報
2. 陳平原(2002)。《中國文學研究現代化進程二編》 第1版 北京市:北京大學出版社。
3. 李學勤(2001)。《中國學術史》。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
4. 于素波(1994)。《孫子學文獻提要》。中國軍事科學出版社
5. 于汝波(2001)。《孫子兵法研究史》。中國軍事科學出版社
6. 盛瑞裕、李崇興與汪超宏(1995)。《十家注孫子兵法譯注》。吉林文史出版社。
7. 邱復興(2004)。《孫子兵學大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8. 高佑仁(2018)。《清華伍書類文獻研究》。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9. 陳啟天(1947)。《孫子兵法之綜合研究》。上海:中華書局，取自
<http://global.mgebooks.com.ezproxy.eduhk.hk/detail.aspx?id=76318>
10. 郭化若(2006)。《孫子譯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11. 吳如嵩(2003)。《孫子兵法淺說》。商務印書館
12. 張建映與張躍濱(2005)。《馬克思主義哲學讀本》。清華大學出版社有限公司
13. 陶漢章(1985)。《孫子兵法概論》。解放軍出版社
14. 李零(1997)。《吳孫子發微》。北京:中華書局
15. 李零(2006)。《兵以詐立・我讀孫子》。北京:中華書局
16. 楊炳安(1986)。《孫子會箋》。中州古籍出版社
17. 鈕先鍾(1996)。《孫子三論》。麥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8. 魏汝霖(1984)。《孫子今註今譯》。臺灣商務印書館
19. 戚繼光(1996)。《紀效新書》。北京:中華書局
20. 張明與于井堯(2006)。《中國古代軍事思想史》。吉林文史出版社

21. 葉至誠與葉立誠(1999)。《研究方法與論文寫作》。台北:商鼎文化，頁 138-156
22. 王光軍(2000)。《孫子兵法全典》。北京:印刷工業出版社
23. 鈕先鍾(1997)。《歷史與戰略:中西軍事史新論》。臺北市:麥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24. Lionel Giles(2000), The art of war, Allandale Online Publishing
25. 李加武(2014)。〈孫子兵法“勢”義簡析〉。《長春大學學報》，11(24)，頁 1608-1609
26. 李贄，閔於忱(1995)《孫子參同:五卷》。臺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27. 劉申寧(1990)。《中國兵書總目》。北京:國防大學出版社